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教化特色探讨¹

谢旭斌 张鑫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湖湘传统村落教化景观具有类型丰富、形式多样、审美意蕴鲜明的特色，其教化的核心是重教明礼、杨义举善、率真存厚。反映了伦理、仁爱、孝道、礼仪的德治礼教观，体现了崇尚自然、和谐、朴实、率真的艺术观。湖湘村落景观的审美教化生成于自然启示、伦理教化、儒道礼教、神巫文化、理学宗法的启悟、感召与自觉。分析其教化特色与内涵价值，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伦理价值观、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宣传路径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湖湘传统村落景观；审美教化；宗族伦理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7)05—0115—07

在湖湘传统村落，无论是乡贤志士还是平民老百姓，历来注重审美教化的作用，他们都喜欢在住居的建筑梁柱、窗花、地面、家具上雕刻、绘制、书写关于教化的审美图像、文字，寄托对富贵安康、吉祥美满生活的向往。作为人类主要居住形式的传统村落，伴随着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却正在快速衰落。自2012年至今，我国共启动了四批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相关保护措施。湖湘共有257个传统村落入选，这些村落集中分布在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经济相对欠发达的湘西、湘南地区，而湘东、湘北、湘中地区较少，其中分布在湘西地区的数量约占62.65%(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邵阳市、张家界)。湖湘传统村落具有一系列伦理教化与自成体系的教化性景观，主要体现在沉稳、朴实的建筑风格，宗祠、民居、牌坊等建筑景观及砖瓦材料、门窗木雕、庭院空间、堂屋门帘、神龛家仙、对联匾额等建筑构件、艺术装饰所蕴含的教化内容、审美教义、艺术精神及文化价值上。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受湖湘地理环境的自然启示与伦理教化的审美生成、湖湘理学文化、神巫风俗及宗族家法、先贤君子文化的审美教化影响。随着传统村落的快速消失，拥有深厚教化内涵与审美教化特色的景观也快速消亡，研究、关注传统村落教化性景观对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现代文化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基于自然启示的审美生成

通过实证考察，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教化意义与审美教化源于自然的启示与生产实践的经验积累。人们关于地理、环境、季节、气候、时空、方位等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于自然万物相生相克的现象启示及自然万物枯荣的审美意识，逐渐生成生命存在、因果伦理的审美教化观念。

(一) 自然教化的审美生成

收稿日期:2017-03-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6YJA760045)

作者简介:谢旭斌(1972—)，男，湖南洞口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设计、艺术哲学

源于对自然生命力的感知而生成的审美应景现象。由于“乡民思维方法的直观性……是一种重事实、重比较、重经验、重悟性的思维方式”^[1]，受自然万物的生机与生物季相的变化，使人们在景观物象中体验生命的存在、感悟生命的本源、感知自然教化的意义。这些景象被转化为动物、植物或几何图形、文字等符号，从而移植到建筑构件与装饰中，构成了审美教化的内容，也构成了感受审美教化的途径，实现了主客体的审美统一。这些寄托吉祥如意、繁衍生息、审美教化主旨的景观形象，因地域环境的不同，其题材内容、艺术形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艺术审美及教化表征的主旨是真、善、仁、义、礼，审美意蕴是深邃、富有哲理的。比较湖湘不同地域村落的动植物纹饰，有着相同的教化题材与审美教化，但其表征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如同样在石础上雕刻植物纹饰来表征美丽、生命、繁衍等审美意蕴，处于湘西南的新邵爽溪村利用了杜鹃、菊花等；湘南的祁东荷叶塘村利用了桃花、石榴等，攸陂村利用了向日葵、灵芝草、藤蔓卷草等；湘西辰溪五宝田利用了兰花、梅花等本土花草植物形态。不难理解，虽表达同一主题，但审美的形象是各异的。“其表达的主题、内容多与村落环境、地域文化、审美心理构成互文、映衬关系，纹样大都来源于地域性的自然景观，如乡土植物、花鸟。一花一叶总关情，哪怕只是朵无名小花，都映衬出村民的审美追求，都能引人走进一片神奇的艺术世界。在辰溪县的五宝田古村落，春兰的图案被雕刻在建筑的墙壁、门楣、神龛，甚至地面的青竹石板上，与山上的兰花相映照，引人赞叹”^[2]。

（二）审美教化的形式与方法

湖湘传统村落教化性景观的教化形式主要表现在宗祠、庙堂、墓志、碑铭等礼教建筑与民居中：形式中，透过马头墙、飞檐翘角、檐口、梁柱、门匾、门簪、横联、门窗木雕、门槛、石墩、石柱等建筑构件与装饰，通过自然物象的各种形态特征并采用艺术表现的手法，将祥瑞意的自然景象、仁义智信的经典故事、扬善抑恶的戏剧与历史传说等审美教化的意义表征出来。

村落审美教化表现的方法，主要包括：（1）运用联想、隐喻同构、寓意双关、谐音取意的抽象方法即以“以形譬义、‘依声托事’”的手法，把器物形态的象征意味与其名称谐音的隐喻意味结合起来，在花中有花、题中有题的‘画外音’里，将乡民欢乐、吉庆、祝福、祈愿等方面的文化意识表达出来。以蝙蝠喻‘福’，以桃表寿，以古钱表‘全，或‘前，等’^[1]。既达到祈求吉祥、抒发审美、表达幸福的愿景，又具有审美教化的作用。（2）通过写实的手法展示、描绘耕田、砍柴、放牛、捕鱼等现实劳动场景，及亭台楼阁、奇珍异草、飞禽走兽、鱼虾虫蛇等各类自然生机景象。（3）通过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表达美好愿景；（4）运用吉祥文字、几何图形等方法。五宝田传统村落就有多幅“双龙戏珠”“双凤朝阳”“天官赐福”“野鹿含花”“麒麟送子”的隐喻同构图，单就青竹石刻的万字纹、寿字纹、云雷纹等几何图案就有30多种，审美教化之意明显。爽溪村窗扇刻有“养心斋”“福、禄、喜、寿”等教化寓意文字的镂空砖雕、木雕图案达有20多处，石柱所刻的杜鹃、菊花、兰草、锦鸡等花鸟形态大多源自本土动植物。沙井老屋的山水壁画、戏曲人物、神话传说等带有地域性的审美教化意义。沙井老屋中一住宅转角石上就雕刻有燕、梅、鹿的楷体字与造型具象的动物形象，其中三只燕子造型轻盈生动、做衔泥筑巢状，梅花枝干苍劲挺拔，小鹿回头顾盼、欢快跳跃、生动逼真，既包含富贵同春、平安求禄等教化寓意，又彰显生命律动的审美感受。宜章县蜡园村门簪上的向日葵图案，及其门壁石板上阴刻“敦行孝友师张仲、培养芝兰拟谢安”的对联。它们是对自然审美的应景与转化，表征了“美好、富贵、高洁、生机、纯朴、贤德、俊雅”的情怀、境界与审美追求，所传递的教化寓意已经成为人们对于理想品格的精神象征。如兰花般德泽长留、经久不衰，像向日葵般金色灿烂、多子多福，其教化寓意呼之欲出，影响着代代子孙。

二湖湘传统村落伦理教化特色

教化是人的一种行为属性，也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表现在行为道德方面的教育和感化。伦理教化自古就有“达到人性的崇高教化”之主张。受湖湘地域文化及伦理文化基因的影响，湖湘传统村落教化景观

的核心是伦理文化，注重崇文尚武、敢为人先、学而图强的品质。教化性景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和审美观，同时是湖湘儒家文化、地域巫文化、理学文化的集中体现。

（一）生态伦理观与生态理想模式

由于趋吉避凶的心理需要及囿于对自然现象的迷惑，产生了特定的伦理教化观与生态伦理观。一方面，人们看到自然山川的葱郁、阔野平田的生机，会感到心胸开阔，豁然开朗。日月嬗变、季节变换、植物枯荣、动物生息等自然生命现象，触发了人对生老病死及万物生长循环的感性认识，产生了“万物有灵观”“报恩观”等。人们通过敬山神、敬水神、开秧门、尝新节等宗教礼仪及民风习俗，表达对风调雨顺、土地繁盛的期盼与感激。另一方面，面对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而产生的“生态伦理观”，主要体现在村落选址遵循依山傍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以及为达到生态平衡而产生的封山育林等民约、禁碑。《论语·述而》中有：“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反对春天采伐田猎，钓鱼而不网鱼，只射飞鸟而不射巢中的鸟，以达到不绝流而渔、不绝生而猎的目的。立足湖湘花鸟虫鱼题材的乡土画家王愍山，在其一作品中就题款“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表现出浓浓的教化启示和淳绵人文情怀。

由于传统村落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伦理教化与审美意蕴源于生产实践、审美经验。一方面源于村民对生存条件和生活资料所需山、水、田、地等自然因素和对生产资料的需要。湖湘多丘陵山地、多水系的地形地貌，由此形成“山、水、田、地、村”相融的湖湘聚落格局。另一方面为实现生产资料、生活居住的生态理想环境，湖湘村落堪舆选址的审美模式就是“人、山、水、村、田、地”统一的模山范水观、天人一体的生态观。以湘西为例，“湘西先民受大自然环境的心理启迪和中国古代生成论思想的影响，在村落选址、堪舆规划的过程中就常遵循‘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生成论的思想”^[3]。湖湘传统村落选址多背山面水，建筑多依山而建，村落空间总体七形成“山、水、村、田、地”的三维聚落图景。如五宝田传统村落建筑群就是依模山范水的理想，依山势呈阶梯状布置，靠背为龙脉山，前有蜿蜒小溪、村前盆地有农田、菜地、水塘，实现了建筑形态、空间布局、结构、功能、材质等统一的鲜明特色。

（二）传统礼制文化的教化影响

受湖湘文化与传统礼教文化的影响，其规定和教化主张直接影响了传统村落景观的空间体量、形制开间、颜色材质等形式布局。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其主张的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人伦关系被强化为道德教化。“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落后性，我们必须加以扬弃。这些礼制文化主要体现在村落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并体现在建筑的开间、屋架、选材的形制上。在《大唐六典》《大清会典事例》中都有相关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堂舍，不能超过五间九架……另外平民的堂屋不得超过三间五架，门屋不能超过一间两架^[4]，否则是超越了礼法，这无疑是旧的宗法社会中的一种礼仪尊卑的展现。此外这种社会秩序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姓名辈份排列、装饰、服装、建筑、车马等方面，包括台基的高度限制。同时，建筑层次、门面空间、装饰形象都受礼制影响。大户人家一般用狮子、老虎、大象，小户一般用小鹿及飞鸟等。比较辰溪县的龚家湾村和五宝田村落，两个村落的建筑风格、空间结构、装饰就有明显区别，虽居住都遵循“尚中”思想，堂屋及厢房围绕天井构成四合院形式，堂屋处于轴线的中心位置，地位最高，因此体量最大，房间大小也会随着地位的高低做出对应的变化⁽⁴⁾，但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龚家湾村的院落式空间布局和门楼形制较五宝田讲究，院落空间大、选材、布局讲究，形制隆重。分析其原因，除其经济发展外，主要源于龚家湾村落出的官品大员高、乡贤多，按礼制，其建筑体量、材料工艺、装饰等级自然也高。这也可从龚家湾院落式住宅的入口可知，外入口为八字门形式，立柱、额枋、面壁均为打磨光滑规整的石头，且做工精细。内入口一般具有槽门式，有三个出人

口，“按照礼制社会的规定，平时出入房屋是在两边，并且严格执行东进西出的规定；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尤其是达官贵人就会直接从中门出入，以此表示对客人的尊敬，从这一行为，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尊卑观念无处不在，还可以折射出人们‘尚中’思想的根深蒂固”^[4]。

（三）神巫宗教习俗的教化特性

“自古受自然崇拜、祭祀巫术、歌舞遗风的互文影响……湖湘地理‘蛮荒’、封闭、原始，生成的祭祀、巫术、歌舞、民风习俗，如今通过湖湘传统村落之间的过年贴喜钱、年画、剪纸、楹联和打糍粑、唱傩戏等形式保留下来。这在历代文献、湖湘地方志中皆有记载”^[2]。受泛灵论残余思想影响，有些偏远传统村落仍有崇巫尚鬼的陋习，主要体现在对神灵的畏惧与敬仰。如在建筑动土前要请先生看日子，在出殡前要请阴阳先生择定日期和地点，在杀鸡宰羊前要判吉凶，过程中嘴里不断叨唠着“不是我要杀你，是刀要杀你……”这些都是民间巫术思想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乡村尚巫习俗对于乡村教化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外化”模式，即村民出于对鬼神的敬畏而秉持“因果报应”的理念。但是，这种教化形式是充满未知，不稳定的，一旦民众对鬼神的观念发生变化，对鬼神的存在提出质疑，这种“外向”的教化无疑将失去效用^[5]。

由于村落中普遍存在同族血缘的关系，村民们普遍信仰祖先崇拜。为感激先祖的庇护及教诲恩德，实现反哺报恩的道德需求，湖湘传统村落都有在堂屋设置神龛敬祖的习俗，仍有“写家仙”以安祖先牌位的风俗。湖湘村落堂屋神龛上一般常写“天地国亲师”，另一种多以姓氏先祖与歌颂祖德的文字为主。以五宝田村萧守造、萧典乐老人为例，在重要节庆日里，他们会点香进行敬神的活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吃饭前有把装有米饭的碗筷放在桌上摆放一下，然后自己再用餐的习俗，在喝酒前，心中默念祈语，筷子三次蘸取酒水撒于空中，希望能够得到祖先的保佑。清明节要“挂青”，中元节要烧纸钱、摆碗筷、行祭请祖先的仪式，以感悟生命、缅怀先祖，达到对祖先、自然的敬畏和驱邪趋吉的心理愿望。

（四）湖湘理学文化的教化思想

理学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的“新儒学”，融通了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宋明时期理学文化兴起，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郭谦在《湘南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一书中提到“理学是儒家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具有多层次的丰富内容，一是它吸收了佛、道教内容，建立了精细庞大的思辨哲学体系，二是将儒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集中表现在‘教化’的思想和实践上。”^[6]

湖湘传统村落大多受湖湘理学文化的鼻祖周敦颐《太极图》及《太极图说》的审美教化影响。“《太极图》是对宇宙生成及万物化生的直观示意图，五个层次、大小十个圆，连接线加二十六字图题。《太极图说》是说明式的学术文章，前部分是对《太极图》的论述、诠释”^[7]。受中国儒学礼教、周敦颐理学观念及自然环境心理启迪和中国古代生成论思想的影响，湖湘传统村落在选址、堪舆规划的过程中就常遵循《太极图》式，注重“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生成论的思想。邵阳新邵的仓场村因与周敦颐有同门共族关系，遵循太极图理论，选址在四面环山的长条形盆地，村前有岱溪和至今四季喷涌长流的温泉水环绕仓场村流淌，这也是周氏宗祠门联上“温泉抱绕濂溪第”的出典。据实地考察，仓场村保存至今的古民居尚有10余座，在门楣、堂屋的正梁柱下部以及窗户上，至今还保留有雕刻或绘制阴阳鱼、八卦图形的习惯。其中保护较完整的是木结构居住院落——周家大院，坐北朝南，五进五出，建筑风格古朴大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教化特征。正如“濂溪第”院门的两侧对联：“饮温泉水长吟贤哲之书，居用里家永仰祖宗之德，”室内道光皇帝所赐金匾“节媳松筠”，另有“忠孝传家”“细柳风高”等匾额，成为尊荣恩宠、歌功颂德、凝聚人心、教化后人的重要形式。尤其后厅挂满了多种教化思想匾额、先贤人物事迹、格言，像“百善孝为先”、“二十四孝民歌”等，劝谕教化人们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呼应周氏家族十二条家规家训。“正如易学家所说‘天地万物之根本，天地为太极所造’，它代表天地一体，造化阴阳，

平安清吉，富贵绵长”^[8]。武冈浪石村门壁石刻对联“往来若乾坤旋地，出入如日月经天”“闾阖有乾坤在抱，升恒如日月当中”。在宜章县蜡园村门簪上刻有乾坤符号；桂阳县阳山古村门簪上的阴阳八卦或太极图，无不反映了“道生一，一生万物”的生成理论思想，这也是源于对自然的观察与事物发生、发展的经验总结和认识的结果，摒弃一些神秘迷信思想，其堪輿选址观对现今的平面布局、空间选址仍具有科学和教化意义。

三家族宗法、乡贤文化的教化方式

湖湘村落景观教化的核心是伦理教化，重视德治、礼治的教化内容。主要反映在以族群聚集、祖规家训、神龛家仙为特点的宗族文化观、神灵观以及以乡贤文化为代表的道德教化观。

（一）伦理教化的外化与内化机制

基于伦理性教化为核心的湖湘传统村落，注重崇文与尚武的教化，强调祖规家训的外化教育与自省内化的结合。外化性的景观形态包括宗祠、家庙、神堂、私塾、耕读所等礼教建筑以及各种庭院、堂屋门帘、神龛家仙及各种族规家训等为教义的族谱、家书、壁画、楹联、雕刻。现存较为完整、具有历史脉络的村落教化景观形式当属族谱家规的保存与发展。传统村落旧时外化教育机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影响最深的是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师徒教育以及乡贤的言传身教。外化机制的教化最重要的途径是学校形式的学习，包括私塾、耕读所、养心斋等，耕读兴家是我国传统村落祖训的基本内容。辰溪县五宝田耕读所，是村民专门进行储粮和耕读、进行诗书礼仪的教化场所。“耕读兴家”是萧氏的祖训，受交通环境限制，萧氏先贤专门修建了耕读两用的耕读所，其采用庭院式，平面包括宝凤楼、教室、操场、火房、晒楼、牛栏等，空间布局与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文教、农耕的区域划分，体现了耕读两用的功能。整个建筑形态端正，审美意象灵秀飞扬。其正楼为五开间，屋顶为歇山顶，屋角嫩戗发戗，轻盈上翘；两翼横屋则采用悬山顶；屋檐与封火山墙交织，错落有致；正吻以及屋角和山墙起翘处形如展翅张扬的飞鸟，端正活泼、气宇轩扬、充满生机。前、后门门额上分别写有“源源而来”“三余余三”四个格外醒目的大字，告诫学生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和取陶渊明“余常以三余之日，讲习三暇，读其文”的勤勉。耕读所作为文教建筑，可见其寓意在于激励后人勤俭，用心读书。据实地考察时萧守造老人讲述：“萧氏子孙秉承耕读兴家的祖训，要求子弟躬耕自给，学手艺，习技术，勤奋努力，耕读并重，反对好逸恶劳，不劳而获”。把中国传统伦理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意义，转化为治家教子、修己安民的理念而展开，把忧患意识和耕读兴家合二为一，来勉励子孙。

自省内化表现于由内而外的文化自觉及对自己欲望的调节与去除，主要表现在对欲望、礼仪的节制。近代教育家魏源重视情感教育及价值观内化的意义，强调“‘故言立不如默成，强入不如积感’‘无言之教，人格感化’”，《荀子·荣辱》里有“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荀子认为人都有基本的生存需求，却不能欲求无度。对此“生而有欲而节”的教化主要表现在村落的节庆、礼仪、歌舞戏曲、神话故事、因果缘由的宗教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中。通过家庭教育、乡贤教化、“讲圣谕”、“训诫”等多种方法以达到自我教化的结果。在湘西、湘南传统村落至今仍保留有训诫性的教育风俗，若自家孩子出现偷盗或者赌博等恶劣行为，家里会邀请村里乡贤及德高望重的叔叔伯伯一起教育孩子。据考察得知，之前村子里每户人家堂屋两边都会有训儿凳，长辈坐一边，晚辈坐一边，长辈教育晚辈怎么做人，给孩子讲道理，以助孩子洗心革面、努力纠正错误，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长期以来这个训儿凳带有浓厚的教化色彩，只要大家看到这个物件不由自主地告诫自己不能做错事，不能走歪路，时刻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总结，自我教育。

（二）家族宗法观的教化理想

湖湘传统村落大多是以姓氏和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是一个以血缘、宗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对维护家族稳定、维系民族内聚起到积极作用。宗祠在整个村落宗族结构中起着聚集商议、资族育人、伦理教化、祭祀祖先的作用。象征乡贤文化及宗族文化的祠堂，实际上是社会伦理和家族秩序的意义表征，是激励教化和资族育人的培育场地。正如郴州庙下古村广公祠的大门青石板柱壁上雕刻“万家烟火承祖德、百代衣冠焕人文”；玺公祠的右边写着“礼门”，左边写着“义路”及对联“日月精光，高临剑阁；乾坤锐气，大萃钟山”，寓意君子应循行礼仪和正大光明之道；文龙阁书院门联上“剑阁钟灵，瑞气冲凌霄汉外；讲经吐秀，文光直射斗牛边”，阳公祠门联“普天率土，莫不尊亲，任万物纷纭，何如务本；照幽激明，日维礼乐，愿合群敬爱，张我宗风”“秉敬宗睦族之心，推诚以发；得石洞鸡山之秀，其后必兴”。古人云：“君子营建宫室，宗庙为先，诚以祖宗发源之地，支派皆多源于兹”^[9]。宗祠也是族规禁约的地方，内容包括封山育林、偷盗砍伐、“同姓不婚”、祖坟、耕牛、耕种狩猎的禁忌保护等道德教化。禁约形式多为墙壁书写、石碑刻画等。

传统村落现存的一些楹联壁画、石雕石刻、门窗木雕、庭院植被往往都体现了其教化意义。如洞口伏龙洲萧氏宗祠室内，“高风、亮节、率祖、敬宗、崇文尚武、厚德载物、德耀祖先”等教化意义的匾额、壁画题字共有48幅；木柱上写有“弘扬中华美德建设和谐社会、垂裕祖宗风范促成淳朴民风”“平溪滔滔月明清风知儿孙福寿、雪峰巍巍茂林修竹感宗祠圣洁”等对联就有10幅。洞口曾八祠堂也有“爱生”“尊师”“守孝经训先人自有遗风、开理学门后起当思进步”“文化品格历史担当、开拓精神公益理念”等匾额、对联、题字共约30多幅。查阅新取仓场村筱溪张氏民国六年族谱祠堂记的序言，就有“家之有祠所以妥先灵而展孝思也，我族添禄公自明万历戊申（1608年）于筱溪石禾塘下手天马山对门太子庙下立屋宇以栖神泊”，在刊印的祠堂全图的正门就清晰刻印着“忠诚报国、孝友传家”八个大字，牌楼两侧分别刻有“绳其祖武、诒厥孙谋”。要遵循祖制、教诲子孙，把忠诚报国、孝友传家的传统传承下去。这些教化的文字已保存四百多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围绕“忠诚报国、孝友传家”的核心教化理念，在大门楹联“妥先灵于勿替、垂后裔以无疆”，中堂匾额“同祖共源”“孝悌、忠信”“整齐严肃”的壁面字幅。强调族人都要追源思祖，不能忘本。在东西厢各有一副有“满座清谈挥麈尾、一瓯香茗涤诗脾”“偷闲描就迂倪画、随意学来颠米芾”的画联，在鱼池有“预向源头探活水、偶临池畔悟真知”的画联，这三处画联结合人物、山水场景，就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法，教育后人要净化自己思想、要有治国立命、为国分忧的担当，要学习倪瓒、米芾的品质，具有探求真知的求真能力。

（三）族规家训的教化形式

湖湘村落族谱族规、家风家训普遍强调以规维礼，礼立则家齐；族训用以进德，德明则国治的道理。家庭作为教化的基本单位，湖湘传统村落自古就有重视家教家规的传统，注重家教、维护家风是传统村落教化的要求。道德教化进一步落实到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中，“良好家风的形成和保持靠的是家庭教育的‘严’与‘正’、以家训、家规等形式教导子女遵守道德规范，忠于家庭、宗族或国家”^[10]。在我国古代影响较大的有《家范》、《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朱子家训》等，将教化全面推行至日常生活，教化寓意深入人心。这些家训主要倡导“仁、义、礼、智、信”“廉”“耻”等。教谕人们如何忠勇爱国、孝敬父母、善待他人、仁义诚信、谦让为人、助人为乐、崇尚节俭……五宝田《萧氏族谱一族训》中就提出一系列教育子孙、弘扬功德的主张。如在萧氏家规光绪谱中，就提出家规小序共计十条：一爱国家、二修祭祀、三孝父母、四亲（和）兄弟、五笃宗族、六和乡邻、七重农桑、八尚节俭、九读诗书、十戒非为等。同时为教化后辈慎终追远、勿忘祖籍功德，村落多有建堂题号、郡望之称，如五宝田师俭堂、兰陵堂等；在主体建筑的门楣上，多有三瑞流芳、师俭清风、郑侯家声等教化意义的题字。毫无疑问，优良的传统美德是族规家训长期教化的结果。

（四）先贤君子与乡贤志士的道德教化

具有乡贤君子性质的“士族”从春秋战国时逐渐发展，并成为国家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繁宅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维护家族门风起到了重要作用。“乡贤”在《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中德二高尚的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在乡村公共事务、风习教化等乡村文明建设中贡献力量的乡绅或乡贤之士，也都被称为“乡贤”，由此而形成了乡贤文化。按传统的标准可以分为立德（指做人）、二功（指做事）、立言（做学问）三种。“乡贤文化”实际上就是这个地域历代名贤积淀下来的先进文化<榜样文化，是具有思想、有价值的人才主体的一种文化形态。乡贤文化是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与地域文化、姓氏文化、旅游文化、宗族文化、名人文化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价值^[11]。“乡贤”来源于乡村，根植于乡土，来源于大众，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人们长期化形成的一种道德规范，体现着一种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和君子引领作用。乡贤在人们的生活曰苟和行为中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与“族谱族规”、“家风”等相辅相成，对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为人民群众树立道德先锋的榜样。同时乡贤也受到村民的尊重，甚至被奉为神灵。在湖湘传统村落住宅中的神龛，如按尊贵排序写有：“天地国亲师”，以先贤老师加以尊重。正是有了先贤文化的熏陶洗礼，湖湘村落近现代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乡贤有志之士，并为世人所敬仰。从敢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魏源开眼看世界、谭嗣同“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为变法从容赴死、曾国藩淳淳家书的教子治家之道，以及周敦颐第一个提倡儒家理学思想、湖湘乡贤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君子文化的价值理念向人们内在的自觉意识的转化，一靠教育的引领，二靠制度的强化，三靠环境的熏习”^[12]。

受崇文重教、先贤文化、伦理教化的影响，从村落走出的杰出人物，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就有黄兴、陈天华、蔡锷、禹之谟、杨度等，新民主主义共产党人就有毛泽东、蔡和森、彭德怀、刘少奇、任弼时、贺龙、左权等。不可否认，对出生、成长于这些村落的杰出人物，祖规家训的教化及审美教化性景观所带给他们率真求知、耕读立志、忠诚报国、敢为天下先的担当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以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为例，他出生在湘潭韶山冲一农民家庭，居住在周边翠竹、苍松等植被环绕，以青瓦茅草土木为建筑材料，颜色素雅、建筑风格古朴而端庄的屋舍。“从1902年起，他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读书的同时，就一直帮助家里做力所能及的家务——砍柴、放牛、拔草。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和家里长工一样，奋力干活、不怕苦累，这养成了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并且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很深的了解和同情”^[13]。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的资料显示“孝友传家本、忠良报国光；启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其友、本、忠、良、敦、圣……无不深寓儒学意味”^[14]。“忠良报国、启元敦圣”的教义不仅体现在毛氏祖谱家训中、更体现在毛氏宗祠屋脊龙鳌的雕塑、屋顶宝瓶、剑、戟的景观形象所表征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毛泽东从小生活在这里，直到18岁时才离开乡村到外求学。这些审美教化、奋发精神、无不激励着毛泽东树立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四总结

湖湘传统村落教化性景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是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伦理教化与历史文化的演变和发展的见证，培育影响了一批批有道义担当、有民族历史责任、有礼义模范表率的前贤人物，对我国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传统的道德教化功能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甚大，它的内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人们普遍认同和成功内化的道德规范。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教化形式熏陶的影子，比如说大街上的广告语，“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爱国敬业”等，都是受到传统家训家风的影响，但其是家族内部长期劝谕教育的结果，不是口号式的宣传。

湖湘传统民居蕴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民俗信息，是物化的载体，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景观文化因子及艺术审美与人文精神。据多次考察发现，如今大多数传统村落消失殆尽。由于人们对村落景观及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缺失，没有正确认识传统村落所孕育的文明种子和教化智慧，没有正确认识传统村落所包含的文化艺术和历史价值。由于文化短视及少数人贪图眼前的小利益，拆除贩卖或被盗贼盗走珍贵

的石雕、木雕窗花，导致完整保存的村落和古民居几乎不存在。祁东县茶叶塘村民为了防止这一现象，在柱础上刻有“非卖品”或标明所属“祁东县茶叶塘”，既破坏了美观，又降低了其艺术价值。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已不断加大对古村落的保护力度，古建的保护和修缮力度加大，由中国文物基金会发起的“拯救老屋行动”，促进了房屋产权所有人、政府力量、社会民间力量广泛参与拯救老屋的行动。但中国城镇化社会的快速发展，重伦理、讲和睦、明礼仪、求平等、尚自然、崇和谐的湖湘传统的教化性景观消亡速度之快，各种教化信仰、审美价值缺失造成的危害之大，让人瞠目结舌！为此，首先要保存村落的景观风貌、建筑结构与艺术装饰，防止风雨的侵蚀，加强保护、挖掘现存建筑、梁柱、门匾横联、木雕石刻上的艺术审美与文化因子。其次，加紧培养古建修复、景观营造方面的专业人才，为古村古镇进行合理规划、保护与修缮，实现文化保护、旅游开发、审美教化、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避免文物的人为破坏、村落的无序发展。再次，加强立法，制止倒卖贩卖文物、破坏建筑构件、艺术装饰物品的市场和商业行为，加强文化建设与保护资金的投入力度。最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审美教化的熏陶，培养乡贤人士，增强村民对村落文化的历史感和认同感，广泛传播和颂扬乡贤精神，夯实乡村传统文化建设基础。

参考文献

- [1]胡潇.中国乡土的世纪之交[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 [2]谢旭斌.湘南传统村落景观的互文性[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82—187.
- [3]谢旭斌.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文本及其生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60-166.
- [4]刘锐.礼制、宗族、血缘与空间——张谷英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的文化人类学解析[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4.
- [5]江涛.人类学视野中的乡村教化(1949-2014)[D].东北师范大学,2015.
- [6]唐凤鸣,张成城.湘南民居研究[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6:8.
- [7]朱慧芳.理学鼻祖与理学名城[M].长沙:岳麓书社,2015.
- [8]肖自力.古村风韵——张谷英大屋漫步[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 [9]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10]刘静.走向民间生活的明代儒学教化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 [11]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 [12]闻君.中华君子文化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 [13]何虎生.毛泽东——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高菊村.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M].北京:西苑出版社,1993.